

# 试论鸦片经济对清帝国的影响

仲伟民

(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084)

**摘要:**在19世纪,清政府的鸦片政策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界分为两阶段:前一阶段政府的主导政策是禁烟,尽管成效不著,但禁烟政策基本是真实的;后一阶段则基本采取了纵容政策,既不禁进口,也不禁自产自销。到19世纪中后期,清帝国患上了严重的鸦片依赖症。这种鸦片依赖症突出表现为,罂粟种植成为鸦片产区农民生存的基本手段;鸦片贸易成为地区发展的重要动力;鸦片税收成为清政府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途径;鸦片成为日常消费品和新兴城市文化的媒介。此前,学术界一般将清朝的鸦片政策归结为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实际原因是清帝国从上到下、从日常生活到经济社会,都已经无法离开鸦片,导致清政府在鸦片政策上陷入弛与禁的两难。

**关键词:**鸦片依赖症;罂粟种植;禁烟政策;弛与禁

**中图分类号:**K 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6-0146-09

## 一、鸦片依赖症:问题的提出

研究19世纪中英关系史的学者,几乎完全一致地认为,英国之所以对鸦片贸易钟爱有加、特别重视,是因为鸦片贸易是英国维持与亚洲乃至全球贸易的基础。英国在东方建立的殖民地与鸦片经济息息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建立在鸦片经济的基础上。在19世纪,鸦片对于英国政府太重要了,鸦片收入具有平衡英中贸易逆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鸦片贸易,英国既无法大量从美国购买可以让曼彻斯特工厂里的机器运转起来的原棉,更没有办法从中国购买其国内需求旺盛的茶叶。<sup>①</sup>据估算,鸦片战争前后,鸦片贸易不仅占英国财政预算的比例相当高,达10%左右,而且鸦片是英国输出品中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一种商品,其他商品则很难在东方最大的市场打开销路。“使英国贸易保持微妙平衡的整个帝国体系依赖于通过鸦片与其他商品进行贸易来榨取税收或利润而得到的资金。国家规模越大,就越依赖于鸦片”。<sup>②</sup>也就是说,英国政府在东方的贸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依赖于鸦片贸易。在鸦片贸易的链条上,英国是最大的获益者,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有学者尖锐指出:“中国民众在肉体上完全沉溺于毒瘾之时,不列颠政府和不列颠人却在经济上患上了鸦片瘾。”<sup>③</sup>这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

上面所讲,是就鸦片贸易对英国的影响而言,而且学术界的研究也比较充分。但问题的另一面,学术界关注却不是太多。即,在19世纪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染上了鸦片瘾,其实清朝政府也深深患上了鸦片瘾,即本文所说的“帝国鸦片依赖症”。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理解下述现象:在众多的文献中,人们都充满了对鸦片的指责、批判以及关于吸食鸦片的危害等论点,但

收稿日期:2016-07-16

作者简介:仲伟民,男,山东宁阳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 参见 J. Y. Wong, *Deadly Dreams: Opium and the Arrow War (1856-1860)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09-410.

② 卜正民、若林正编著:《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8页。

③ 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坠落》,周辉荣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2页。

我们却依然看到,鸦片在19世纪的中国不仅没有逐渐禁止,清政府反而实行越来越宽松的政策,直至完全放开,从而导致鸦片危害越来越大。

更进一步分析,在19世纪后期,实际上不仅清政府,而且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也是严重地患上了“鸦片依赖症”。如上文所述,我们习惯于将英国以及英印殖民地作为鸦片贸易的最大的获益者,而把中国作为鸦片经济的受害者;受害当然不错,但颇为吊诡的是,同时中国政府也从鸦片经济中获得了实际利益和支持,甚至成为政府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之一。最后我们看到,不仅中国经济上依赖于鸦片,而且普通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也逐渐离不开鸦片,甚至鸦片“在促进农村经济的转型、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抵御‘洋药’的侵蚀,实现进口替代、发展及强化区域经济等方面”<sup>①</sup>,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鸦片生产与贸易在某些地区似乎还起到了一定的“正向”作用。这一点颇让人难堪和费解,但我们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认识为何鸦片毒害中国人如此之深、如此之久,也才能真正认识清政府为何在禁与弛之间摇摆不定,甚至明禁暗纵,最后索性将鸦片贸易视为合法并公开征税。

## 二、清帝国对鸦片经济的依赖

在鸦片政策问题上,清政府经历了一个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清政府严禁鸦片,结果导致中英冲突,中国社会经历了19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大震荡;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标志进入第二个过程,既然鸦片不能禁止,清政府索性放开,不仅允许鸦片进口,而且默许国内自产鸦片,这是造成鸦片深重灾难的一个直接原因;第三个过程,在清王朝即将谢幕前夕,清政府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即开始全面禁止鸦片的生产、销售和吸食。其中第二个过程不仅时间长,整整半个世纪,而且影响深远,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从普通民众到政府财政,已经完全离不开鸦片,所以我说清帝国患上了“鸦片依赖症”。以下四个方面可以得到说明:

### 1. 民众依赖:罂粟种植成为鸦片产区农民生存的基本手段

中国自古有罂粟种植,但19世纪以前皆为花卉欣赏、药材或正常食用之目的。用于吸食鸦片的罂粟大规模种植开始于19世纪以后,大约在19世纪20年代。<sup>②</sup>多种因素促使农民扩大罂粟种植面积,其中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种植罂粟能获得相对较高的经济回报,用以维持生计以及缴纳政府税收和地主地租;其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则是,经过清前中期一百多年和平环境下的休养生息,人口数量增加迅猛,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渐严重,人们为了增加收益,往往选择收益最高的经济作物。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到19世纪后期,人地关系的矛盾已经越来越突出(见表1)。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的一个世纪之内人口增长了约1.6亿,而耕地增长则非常有限,人均土地占有越来越少。就人地关系比例来说,19世纪的中国的的确到了一个极其艰难的时期,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这也是19世纪中国发生危机的最深刻的背景之一。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本的特点在19世纪并无实质性的变化,尽管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了,但是农业生产力在这一时期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某些方面还有退步。“从我国的情况看,鸦片战争后半世纪,农业的生产力可以说没什么革新,还有迹象表明,江南稻谷的亩产量比乾嘉时代有下降的趋势。农产品的商品化不是由于农业生产

<sup>①</sup> 秦和平:《四川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上),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sup>②</sup> 关于为提取鸦片而种植罂粟的记载,最早见于19世纪20年代,首先在东南和西南地区发现。到30年代,已扩展到内地很多地区。《清宣宗实录》卷184“道光十一年二月戊戌”记载,本年(1831)已经发现有几个省份种植罂粟已制作鸦片的情况,道光帝谕令“各省督抚严饬所属,如有奸民钟作鸦片烟,随时拿获究办”。据此推断,用于吸食鸦片的罂粟种植当在19世纪初期。参见拙文:《19世纪中国鸦片的生产替代及其影响》,《文史哲》2009年第5期。

表1 历代人口与耕地比率

年代	耕地 校正数(百万市亩)	年代	人口 校正数(百万市亩)	每人平均市亩数
2	506	2	59	8.57
105	535	105	53	10.09
146	506	146	47	10.76
976	255	961	32	7.96
1072	660	1 109	121	5.45
1393	522	1 391	60	8.70
1581	793	1 592	200	3.96
1662	713	1 662	83	8.59
1784	989	1 776	268	3.69
1812	1 025	1 800	295	3.47
1887	1 202	1 848	426	2.82

资料来源:赵冈、陈仲毅:《中国土地制度史》,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6 页。

力的增进,而是由其他社会因素造成的。”<sup>①</sup>农民土地减少,粮食产量已无再提高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种植各种经济作物便成为绝大多数农民的理性选择,比如种植茶叶、棉花、植桑养蚕等,而 19 世纪中期以后广大农民种植最多的经济作物是效益最高的罂粟。据国际鸦片委员会统计,1906 年,中国国产鸦片数量大约为 584 800 担,合 29 000 吨,几乎占当时世界鸦片总产量的 90%,仅四川一省就达 238 000 担(见表 2)! 如果只从农民的现实处境而不是从所谓道德的角度去理解,农民选择种植上述任何经济作物都是正确选择,因为只有这些经济作物能带给他们较多的经济收入。

表2 1906 年各省鸦片产量估计

地区	产量(担)	地区	产量(担)	地区	产量(担)
合计	584 800	广东	500	陕西	50 000
满洲	15 000	湖南	1 000	甘肃	34 000
直隶	12 000	湖北	3 000	四川	238 000
山东	18 000	江西	300	云南	78 000
江苏	16 000	安徽	6 000	贵州	48 000
浙江	14 000	河南	15 000	广西	500
福建	5 000	山西	30 000	新疆	500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卷,北京: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457 页。

相对于普通粮食作物,农民种植罂粟有三大优势,一是单位面积的相对收益高,对广大农民具有巨大的诱惑力。道光十六年(1836),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上奏称:“查罂粟冬种春收,冬春之间,南方山场杂粮最多,其田亩则种二麦不等,北方之麦,关系民食更大。今鸦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sup>②</sup>前者至少是后者经济价值的 3 倍以上,最多可能达十几倍,如《清宣宗实录》卷 476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壬寅记载,“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19 世纪后期,在广大农村种植罂粟如同种植五谷杂粮一样司空见惯,很多地区家家户户都种,不种反倒很奇怪。云贵川陕等许多地区有大批罂粟种植专业户,华北、江南、华南等地农民也在自己零散的土地竞相种植。二是罂粟种植劳动密集,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旧民族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10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1,道光十六年九月壬午,北京: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13 页。

可吸纳大量剩余劳动力,与其他作物相比,种植罂粟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而这一点恰恰适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土地资源紧张,人均耕地非常少,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价格也便宜。因此在同等数量土地上增加劳动力投入,实际上不仅不会增加太多成本,反而充分利用了闲置的劳动力资源。只要最后的实际经济效益高于其他作物,对于农民来说就是划算的。一般情况下,清末民初在产烟地区的烟土市场上,1两烟土约值大洋1元,1元大洋可以买40斤左右大米,以每亩烟土产量50两计,便可交换大米近2000斤左右。以此计算,每户农民如果种3亩罂粟,在扣除各种杂税后,则基本可以达到温饱或略有剩余的水平。<sup>①</sup>三是罂粟种植有利农时,罂粟是半年生植物,生长期短,秋种春收,播种时间晚而收获时间早,避开了农忙季节,有利于农时安排,王麟飞《酉阳直隶州总志》卷一九记载“冬初种子,夏首割浆,既于农时无损,且得价甚昂,故乡村篱落皆遍种之”;而且农民在种植罂粟时,还可兼种其他作物,比如与小麦等套种,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因此颇受农民欢迎。云南地区的布朗族等在19世纪中期就熟练掌握了罂粟的种植技术,他们从11月烧地,12月下种,次年的5月收割,连种7—15年后另择荒地开垦。<sup>②</sup>此外,罂粟这种作物全身是宝,其汁液可以制作鸦片,烟籽可以榨油,叶子可以喂猪,杆茎可做燃料,粟壳可做药物,等等。另外,国产鸦片由于价格大大低于进口鸦片,市场销路好等因素,都是农民乐意种植的深刻的经济原因。

尤其到19世纪后半期,因为印度、美洲原棉进口以及西方工业品的冲击,中国的棉花种植、家庭纺纱等受到严重影响,中国农民生存状况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农民选择罂粟种植是必然之举。“大抵州民以米与包谷为恒粮,其一切输纳宾馈薪盐零杂之需,多取给予售烟之资,故皆贪种罂粟”。<sup>③</sup>

当然,罂粟种植对农民的这种诱惑需要客观分析。从短期看,罂粟种植给农民带来了实际的利益,增加了农家收入;但是从长远眼光来看,罂粟种植则不仅没有改变广大农民严酷的生活环境,反而使他们的处境更加悲惨。其一,因种植罂粟而染上鸦片瘾的农民越来越多,使他们陷入更加困苦甚至万劫不复的生存状态;其二,因种植罂粟而占用大量耕地,粮食产量受到很大影响,这是造成19世纪中后期经常性大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sup>④</sup>

## 2. 地区经济发展依赖:鸦片贸易成为地区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19世纪,清帝国范围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受到了鸦片经济的影响。不仅广大农村地区深受影响,而且各主要贸易港口和中心也深受影响。比如,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商品经济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就有赖于罂粟种植和鸦片贸易,这方面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不再赘述。但总的来看,因为缺少内地大部分地区罂粟种植面积、产量等相关数据,所以我只能以鸦片贸易为例,并以香港和上海为两个典型做简要分析。

早在19世纪前半期,鸦片贸易就是香港的生存基础,因为早期的香港除了作为英属印度通过各种渠道销往中国的鸦片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贸易。据学者研究,到19世纪40年代末期,印度所产鸦片的四分之三都要运经香港再转卖到内地。比如1845年,香港政府年度工作报告承认鸦片是它出口的主要货物;1847年,香港出口总值226 130英镑,其中鸦片货殖195 625英镑<sup>⑤</sup>,鸦片占到出口总货值的86.5%!也就是说,没有鸦片贸易,香港几乎就是一座死港。即使到了19世纪中后期,“把鸦片转运到中国仍然是殖民地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鸦片贸易和香港是如此明显地纠结在一起,以至于不

① 参见朱庆葆等:《鸦片与近代中国》,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152页。

② 王树五、宋思常编:《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页。

③ 贺宗典、熊鸿漠:《涪州小学乡土地理》卷二,光绪三十一年刻本。转引自秦和平:《四川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上),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3页。

④ 参见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54—157页。

⑤ 参见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57页。



考虑毒品的话就几乎没办法考察早期的殖民地史:殖民地因鸦片而建,并依靠鸦片度过了早期的困难,其主要的商人因鸦片而致富,政府靠鸦片贸易带来的高昂的土地租金和其他税收生活”。<sup>①</sup>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直到 1880 年代,香港始终是鸦片商行总部所在地和分配中心,即所有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仍几乎全部集中于香港,香港消费极少一部分,其余通过上海、广州、厦门等港口全部转运至内地,或经加工后销至北美、澳洲等华工集中的地方,香港政府由此获利甚丰。1880 年,香港政府每年获得鸦片包税银 200 000 两,占港府税收第二位。<sup>②</sup>

上海自 1843 年开埠后,很快成为进口鸦片的重要口岸。1847 年从上海进口的鸦片估计为 16 500 箱,1894 年增加到 32 550 箱(合 35 804 担),分别占全国进口总量的 49.6% 和 57%。其中,1854 年 7 月至 1855 年 6 月的一年中,上海进口的货物总值为 1 262 万两,其中鸦片货殖竟达 911 万两,占到了 72%!当然,在上海进口的鸦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转口到其他口岸的,其中绝大部分转运到宁波和长江流域的几个分运口岸,如镇江、九江、芜湖、汉口,以及北方的天津、烟台、牛庄等口岸。但即使减去这些转口数量后,上海本口岸的进口量仍然很大。因此,在 19 世纪后半期,上海成为鸦片最大的进口口岸、最大的转运口岸和最大的消费口岸。<sup>③</sup>

在 19 世纪后半期,上海经济发展对鸦片贸易的依赖度同样非常高,这可能是当时任何中国城市都无法比拟的。正如林达·库克·约翰逊所说:“尽管鸦片对整个经济来说是有害的,但鸦片销售实际上推动了本地经济,在上海银行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地银行向短期借贷的鸦片商人收取高额利息,反过来又利用鸦片借贷发行银行货币,以便在银两短缺时期取代硬通货,这为港口的货币流通做出了贡献,没有这些纸币的话,整个地区的贸易和经济都会陷入停滞的局面。”<sup>④</sup>也就是说,鸦片已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品了,在很多时候它开始充当了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不仅吸食者对鸦片上瘾,上海“整个城市经济出现了鸦片的‘瘾’,没有它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上海经济既依赖商品的鸦片,也依赖通货的鸦片,其程度可能是其他主要的中国城市都无法比拟的”。<sup>⑤</sup>因为 19 世纪全球化速度的加速,鸦片价格对汇率的影响甚大,从而对全球贸易都产生影响,有时鸦片能起到平衡世界汇率的作用。比如 1875 年曾有过一次汇率的反常波动,这是由于欧洲需要进口大量的丝茶等中国产品,但欧洲又无法提供足够的白银,中国市场白银供应也严重不足。此时,“如果不是鸦片市场对中国和印度之间汇率的空前上升能作出反应,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由于欧洲白银供货不足所引起的真空,这场波动就会大得多,对英国和中国总的贸易的影响也会严重得多”。<sup>⑥</sup>上海作为中国新兴的贸易、金融与工业中心,鸦片贸易“功不可没”。

### 3. 财政依赖:鸦片税收成为清政府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途径

乾隆中期以前,政府财政状况相对来说比较好。从乾隆后期起,政府的财政收入开始呈下降趋势;

① 文基贤:《1845—1885 年香港的鸦片收入》,见卜正民、若林正编著:《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合肥:黄山书社 2009 年版,第 121 页。

② 参见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北京: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293 页。

③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3 页;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88 页;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第 126 页。

④ Linda Cooke Johnson,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 15. 转引自卜正民、若林正编著:《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 年》,第 187 页。

⑤ 戴沙迪:《鸦片·消闲·上海:城市消费经济》,见卜正民、若林正编著:《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 年》,弘侠译,合肥:黄山书社 2009 年版,第 187 页。

⑥ 《领事麦华陀 1876 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见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 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07 页。

至嘉庆、道光年间,政府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已经降至很低的水平。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虽然战败,但军费支出却非常惊人,合计约4 000万两白银,<sup>①</sup>加上战争赔款2 800万元(折合银1 960万两),共计约6 0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当时一年半的财政收入。因为政府财政状况已经很差,国库仅能支出其中的1 290万元,政府强迫广东、江苏等省商民支付了其余的1 510万元。<sup>②</sup>至道光三十年,清政府户部库存银仅有800万余两。<sup>③</sup>

到咸同年间,因为内忧外患加剧,政府财政更显困难。首先看内忧,一是因为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财政最主要的来源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期控制在太平军手中;二是因为全国各地灾害频仍,多年粮食大幅减产。这导致国库收入急遽减少,咸丰二年(1852)至同治二年(1862),国库平均收入仅相当于道光前期常年的70.4%。其中,咸丰三年收入最低,仅相当于常年的41.5%。<sup>④</sup>可以这么说,经过了天平天国战乱,清朝前期雄厚的国库储备至此已经消耗殆尽。其次看外患,一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时间上都超出第一次鸦片战争,军费支出当不会少于4 000万两的数额,二是战争赔款也达到了1 600万两。也就是说,此间因为收入大幅减少,而支出却大幅增加,因此政府财政状况比道光年间更为严重。比如,咸丰十年(1860),仅为筹措100万银两以让英法先行退兵,政府就感到无能为力。奕訢上奏称:英法“两国兵费银两,除已给贍恤银五十万两外,尚应给银一百万两……惟部库及各库仅存银一百余万两,一经拨放,势将告罄……惟有拨用各省银两,以期众擎易举”。<sup>⑤</sup>所谓“拨用各省银两”,其实主要依靠沿海各省,尤其是沿海各省的厘金和海关收入,这是晚清财政结构发生变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厘金和海关收入中,鸦片税举足轻重,且是清政府最稳定的收入来源,如果没有这部分收入,晚清的洋务运动和军费开支都成了大问题。

在晚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中,鸦片税收占了其中相当大的比例。以浙江为例,光绪十五年,全省厘金收入共2 151 121两,其中洋药厘金达400 000两,仅次于百货厘和丝捐;其他年份也在200 000两左右。<sup>⑥</sup>1888年洋药厘金占清政府海关税收的28.43%,洋药税占10.94,两项总计竟达39.37%;1889—1894年,两项总计都在30%以上,1904年前在20%以上,直到1910年,都维持比较高的数字,即使在禁烟实施后的1909年,两项总计仍达15.52%;<sup>⑦</sup>这都是在没有统计土药税的情况下,如果加上土药税,则数据更高。

因此,所谓“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实质上乃以征为目的,即政府变相鼓励了种、吸鸦片。自光绪中叶起,清政府实际上基本放弃了以前的严禁政策,承认鸦片种植和吸食的合法化,以便从各环节中收取税金,缓解财政困难。有学者指出,尽管鸦片这种特殊商品对晚清财政规模的扩张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1840年国内生产的鸦片商品值还是零(估计是因为没有统计数据),但到1894年已达8 450万两,几乎相当于国内其他主要商品茶叶、蚕茧和棉花商品值的总和,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鸦片贸易的增长等同于商品经济的发展”<sup>⑧</sup>,这个观点是极有道理的,因为这是畸形的商品经济发展,从长远看是有严重危害的。

#### 4. 社会依赖:鸦片成为日常消费品和新兴城市文化的媒介

在19世纪,鸦片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消费品,有人戏称鸦片成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

① 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

②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9—433页。

③ 周志初:《晚清财政经济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62页。

④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142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24页。

⑥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09页。

⑦ 汤象龙编著:《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6—67页。

⑧ 周志初:《晚清财政经济研究》,第151—152页。

醋、茶)之后的第八件事了,可见鸦片被人们接受的程度之广泛。吸食鸦片,在任何地方人们都不仅不需要避讳,而且成为日常的待客之道,犹如现在之烟酒待客。鸦片和烟具就堂而皇之地摆在每个家庭的厅堂里,以便随时供家人或客人享用。在一些富裕的家庭,为了防止儿子在外面赌博、嫖娼等败坏行为,父母往往在儿子很小之时就有意培养他们吸食鸦片,目的是让他们待在家里;可想而知,这样做的结果恰恰相反,一些富裕的商人家庭往往也因此败落和破产。鸦片的多少有时还成为衡量家产多少的一个重要标准,比如媒人经常会问男方能吸多少鸦片,因为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家里可能拥有的财产。<sup>①</sup>无论在普通民众之家,还是在官宦商人家庭,吸食鸦片都是一种正常的消费行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烟毒文化”,多数人以为耻,这是 19 世纪中国文化最显著的一个特点。

“烟毒文化”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对鸦片质地与吸食工具的讲究,就非常典型。就鸦片质地而言,当然首选进口鸦片,而进口鸦片又有孟加拉鸦片、麻洼鸦片、波斯鸦片等(每种还有各种等级之分);国产鸦片则以滇黔川三省所产最为有名,其中云土为上,黔土次之,川土又次之,云土中又以南路货最优(产于邱北、景谷、景东一带)。此外,关于鸦片的颜色、香味、油汁、枯润等也大有讲究。至于烟具,瘾君子们同样考究,有的烟枪镶金嵌银,精工细雕,异常精美,既是吸烟的必备工具,也是供人把玩和欣赏的艺术品,诸如象牙枪、宝石枪、沉香枪、虾须枪等,都是非常高档的名枪。最不可思议的是所谓“全枪”,这是指一种只使用一种烟土的百年老枪,被称为烟枪中的极品,据说是“无价之宝”。<sup>②</sup>这种畸形的文化和审美,在 19 世纪的中国不仅被视为常态,甚至成为大家追求的目标。

吸食鸦片同样成为中国新兴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媒介和组成部分。

随着口岸城市的对外开放,中国城市近代化的步伐加快,以鸦片吸食为典型特征的中国新兴城市消闲文化发展到了极致。戴沙迪的《鸦片·消闲·上海:城市消费经济》一文,对此做了极为精彩分析。作者认为,在城市转型过程中,现代城市消费文化在内容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鸦片消费就成为现代城市的一种正常的休闲活动、一种依赖于个人财富和自控能力的、虽然危险但已司空见惯的日常行为,一个并不比赌博和娼妓更为不雅和紧迫性的社会问题。除了纯粹的鸦片馆以外,各种休闲娱乐场所,如茶馆、说书馆、戏院、公园以及妓院,都有鸦片供应,这使吸食鸦片成为上海休闲文化的几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 19 世纪末的上海,鸦片不仅是重要的通货和商品,它还是城市现代形象的重要表征”。<sup>③</sup>以至于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鸦片都成为了真正的主角。

19 世纪中国城乡共有的这种独特的消费文化特征,的确值得认真研究。

### 三、鸦片对晚清政府权力的强化以及对民族主义的助推

罂粟种植和鸦片贸易不仅使为从事鸦片种植、运输、经销的人们提供了丰厚的利润,各级政府在财政上也相当依赖于鸦片经济,从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税收。更值得注意的是,鸦片还是当权者实现政治极权的工具,是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之一,并成为国家政权建设进程中最重要议题之一。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鸦片对强化晚清政府的权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鸦片对强化清政府的权力,确切说,对维持清政府的继续统治极为有效。

我们都知道,鸦片消耗了帝国的财力,大量财富要么流入列强以及中外鸦片贩子的腰包,要么被大量烟民在腾云驾雾中化为乌有。但我们上面也已指出,晚清政府恰恰利用这种畸形的鸦片经济,从大量

① 上海文史馆编:《旧上海的烟赌娼》,上海:百家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6 页。

② 参见朱庆葆等:《鸦片与近代中国》,第 161—162 页。

③ 戴沙迪:《鸦片·消闲·上海:城市消费经济》,见卜正民、若林正编著:《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 年》,第 186—205 页。



罂粟种植者和鸦片吸食者身上榨取了大量财富,从而解决了部分财政困难,勉强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晚清政府实际上对鸦片经济产生了严重依赖。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对华贸易的利益,尤其是鸦片贸易的利益,以英美为首的列强并不希望清政府垮台,不希望中国陷入分裂和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说,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分析,列强既不希望中国灭亡,也不希望中国强大,他们就希望有这么一个软弱但尚能维持运转的政府存在,这样他们既能对中国政府发号施令,又能从中获得最大利益。当年对中国有深入了解的赫德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外国列强有三种办法来控制中国,即“瓜分,改朝换代或者修补满洲人的统治”,但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前两种办法都不可行,唯一可行的是第三种办法,“即把现存的王朝作为一个还在运转的王朝接受下来,并且,一句话,充分利用它”。<sup>①</sup>即列强在控制、压榨清政府的同时,还要设法使这个政府维持下去;而保持这种平衡的诀窍之一,就是在鸦片贸易中采取软硬两手政策。比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当局鉴于清政府已经屈服,事实上开放了鸦片贸易,所以并没有强迫清政府在条约文本中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这是英国政府极为高明的策略;否则,如果激起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并从而引发排外狂潮,将极不利于鸦片贸易的进行,更将危及从中国大量进口国内急需的茶叶。而客观上,清政府没能以武力遏制外国人的鸦片贸易之后,也别无他途,只好容忍鸦片贸易,并尽力从中取得好处。<sup>②</sup>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鉴于中国土产鸦片的竞争力日益增强、中国鸦片消费的大幅度提高以及中国人对鸦片的较为普遍的接受,英国政府才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条文。英国政府正是巧妙利用鸦片贸易这个杠杆,维持了其在东方贸易的霸主地位,清政府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鸦片的帮助和麻醉,勉强延续了几十年。

在19世纪,清政府在阻止鸦片生产和消费方面几乎毫无作为,这有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王国斌认为,清政府之所以在控制鸦片方面不作为,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需要政府特别的力量和决心进行大动员,此点清政府肯定不具备;二是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政府似乎并不知晓鸦片的使用在不断增加;三是对鸦片危害的认识并不清楚。<sup>③</sup>但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帝国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已经严重依赖于鸦片,正所谓“鸦片是大买卖,是税收的巨大来源,和如此庞大的财富比起来,道德上的责难只不过是很小的一点代价而已”。<sup>④</sup>

随着鸦片吸食的扩大化、普遍化,绝大多数中国人事实上已经习以为常,包括原来的禁烟英雄林则徐后来也主张用国产鸦片驱逐进口鸦片,李鸿章更是对国产鸦片持坚定的支持态度。政府官员中仅有极少数坚决主张禁烟,比如张之洞和锡良等。从目前所见材料来看,大部分政府官员都主张弛禁。真正坚决反对鸦片生产和贸易的多数是地方精英,尽管他们不能直接影响政府决策,但他们在19世纪末期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地方大员有时利用鸦片政策来协调国家与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并通过鸦片问题的讨论将地方精英拉拢到权力结构中来。总之,鸦片问题的讨论助推了民族主义情结,精英的广泛参与国际反吸毒组织的结合,则促成了清末禁烟运动的成功。

本文以极其矛盾的心态,论述了鸦片对于中国的“合理性”。毋庸置疑,我说的这种“合理性”肯定是带有讽刺和苦涩意味的,是19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经济扭曲发展的结果。实际上,鸦片贸易的繁荣以及国产鸦片的迅猛增长,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也使清政府长期陷入“弛”与“禁”的两难处境。但总的来看,清政府长期采取了“弛”的政策,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苟延残喘。而这种

① 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叶凤美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2页。

② 参见凯瑟琳·布鲁纳、约翰·费正清等主编:《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陈绎译,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③ 王国斌:《鸦片和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见卜正民、若林正编著:《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第211页。笔者对第二点持怀疑态度,政府不可能不知吸烟人数逐渐增多的事实。

④ 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坠落》,周辉荣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78页。



政策的实际结果,导致清帝国一步步迈向灾难的深渊。比如,国内白银外流进一步加剧了银贵钱贱的趋势,导致国内经济危机,禁烟本来是为了遏制白银外流,但后来征收鸦片税却成为清政府最为可靠的财政收入来源;鸦片消费的增长,进一步削弱了正常的社会购买力,而民众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则导致城乡工商业的凋敝,从而反过来又影响到清政府赋税的正常征收。<sup>①</sup> 加上 19 世纪战争与外患不断,最终导致国力的衰落,国家始终在风雨飘摇之中。尽管清政府在 20 世纪初力图通过新政挽救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但最后仍未能摆脱灭亡的厄运,其中鸦片所造成的危害不容低估。

## The Dependence of the Empire on Opium: To Ban or Not to Ban ——the Qing Dynasty's Opium Policy after the Second Opium War

Zhong Weim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sup>th</sup> century, the Second Opium War marked a watershed in the Qing Dynasty's opium policy. Before the War, the Imperial Court of the Qing Dynasty made and actually implemented a policy to ban opium, although with little consequence. After the War, the policy on opium ban remained a mere rhetoric, while opium was actually allowed in practice. The fact was that in the late 19<sup>th</sup> century, the Qing Government heavily depended on opium, which was manifested in several aspects. First, the Imperial Court heavily depended on opium market as a source of its revenue. Second, a dominant voice among politicians and literati at the time was to drive imported opium out of the Chinese market with domestically grown opium. And third, taking opium became a part of daily life of the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who were innocent of the harm of opium. The prevailing view that attributes the Qing Dynasty's opium policy to its corruption and impotency is over simplified. The fact was that the Imperial Court's heavy dependence on opium led it into a dilemma on whether to ban opium or not.

**Key words:** opium dependency, poppy cultivation, policy on opium ban, to ban opium or not to ban

(责任编辑 刘曙光)

---

<sup>①</sup> 周志初:《晚清财政经济研究》,第 60—64 页。